

开·卷·书·坊

旧日文事

龚明德

上海辞书出版社

开·卷·书·坊

旧日文事
龚明德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日文事 / 龚明德著.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5. 8

(开卷书坊. 第4辑)

ISBN 978-7-5326-4401-8

I. ①旧… II. ①龚…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1496 号

旧日文事

龚明德 著

责任编辑/杨 凯 辛 琪 装帧设计/朱赢椿

技术编辑/顾 晴 责任校对/左钟亮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辞书出版社出版

200040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www.cishu.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32 印张 6.625 字数 85 000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4401-8/I·257

定价: 32.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68180638

旧
日
文
事

目录

- 001 鲁迅《一件小事》二题
- 017 鲁迅日记和《野草》两则注文欠确
- 037 两个《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特辑》
- 047 瞿秋白“负责总编”的《文学》
- 058 《〈邻二〉佚文》袭自《〈邻二〉的佚文》
- 065 偷摘纸型盗印的《浣衣母》
- 074 左联后期的“林矛”自捧
- 081 老川大的《工作》和《半月文艺》
- 120 叶圣陶与《笔阵》
- 126 张爱玲《传奇》小说集的篇目
- 133 谢冰莹《一个女兵的自传》续集
- 139 何其芳“文生”版《夜歌》的出版月份
- 146 刘盛亚《再生记》讨论会上艾芜的发言
- 156 艾芜的一天记事兼说《人民文学(专页)》

- 163 艾芜等十二人“座谈”周扬文章在
哪一天？
- 173 尚待完善的《艾芜全集》“书信”卷
- 198 编后

鲁迅《一件小事》二题

《一件小事》写于哪一天？

鲁迅《一件小事》的写作时间，在人数众多的“鲁研”界研究成果中，至今仍未坐实到具体是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中的哪一天。

作品最初在《晨报周年纪念增刊》发表时，没有注明写作时间。一九二三年八月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初次出版的鲁迅短篇小说集《呐喊》中，这篇作品的末尾注明的是“一九二〇年七月”，系鲁迅一九二二年五月中旬编《呐喊》时凭记忆补写的，不准确。但是这个不准确的“一九二〇年七月”的写作时间，在其后多种版本的《鲁迅全集》和各种重印的《呐喊》单行本和选本的该作品文末却一直被照录。

一九五六年十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十卷本《鲁迅全集》第一卷对《一件小事》的写作时间和

发表时间作了一个注：“本篇最初可能发表于一九二〇年七月的北京《晨报》，因为一时还未找到这一期的该报，所以未能确定。”

一九八一年十六卷本和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八卷本《鲁迅全集》第一卷查证了《一件小事》的发表时间，为“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北京《晨报周年纪念增刊》”，写作时间是一个推测：“据报刊发表的年月及《鲁迅日记》，本篇写作时间当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这里的注释其实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包子衍《〈呐喊〉〈彷徨〉琐记》有关部分的文字。包子衍在抄录了鲁迅日记中涉及《一件小事》的内容后，写道：“如果这样，此文当作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间。”

查阅当年相关时段《晨报》上的《晨报周年纪念增刊》出版预告，再参照周作人、胡适和鲁迅自己的日记，《一件小事》的写作时间可以落实到具体哪一天。

北京的《晨报》出版“周年纪念增刊”的决定，公布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这五天的每日该报第二版右上角，字号大、加粗框，非常醒

目，题为《本报周年纪念大增刊豫告》，预告中有这样的句子，说包括“小说”在内的各“门”文章“皆请海内名家担任编述”。这儿的“编述”，就是“供稿”。也就是说，《晨报》编辑部是在完全落实了全部作者的“编述”承诺之后，才在《晨报》上登“周年纪念增刊”广告的。从周作人、胡适和鲁迅这三个“文艺”栏的作者的日记中，可以推知晨报馆是在这年十一月中旬头几天陆续发出约稿公函的。

在《晨报周年纪念增刊》“文艺”栏发表了译品《圣处女的花园》的周作人，在他当年的日记中有相关的记载。查周作人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的日记并参阅《晨报周年纪念增刊》“文艺”栏，他是十日下午“得晨报社函”、十三日译“小说《圣母的花园》了”、十五日写《圣处女的花园》译后小记、二十日寄“晨报社函小说稿一篇”的。周作人译“俄人库普林”短篇小说在发表时易名为《圣处女的花园》，与周作人日记中记载的《圣母的花园》不完全一样。署“起明”译，“起明”是周作人的笔名之一。

週年紀念增刊第三張

文藝

●通訊

可以說，這是一篇，
寫得很好的通訊。
作者對於這件通訊，
是極其熱誠的。
作者對於這件通訊，
是極其熱誠的。
作者對於這件通訊，
是極其熱誠的。

●農性、學生、勞動者

這是一篇，
寫得很好的通訊。
作者對於這件通訊，
是極其熱誠的。
作者對於這件通訊，
是極其熱誠的。
作者對於這件通訊，
是極其熱誠的。

●一件小事

這是一篇，
寫得很好的通訊。
作者對於這件通訊，
是極其熱誠的。
作者對於這件通訊，
是極其熱誠的。
作者對於這件通訊，
是極其熱誠的。

●路環的遊記

這是一篇，
寫得很好的通訊。
作者對於這件通訊，
是極其熱誠的。
作者對於這件通訊，
是極其熱誠的。
作者對於這件通訊，
是極其熱誠的。



Portrait of a man, likely Lu Xun, associated with the article 'A Little Thing'.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晨報周年紀念增刊》發表魯迅《一件小事》

胡适在当时是大忙人，他是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答复晨报馆同意供稿的。查胡适当年日记，他本来是计划一周后的十一月十八日晚给《晨报周年纪念增刊》写供稿，在十八日这一天日记的“预算”栏晚七至十点四个钟点数后写着“答书若完，作传或作《晨报》文、文法讲义”，但在同行后的“实行”格中却是空白，也就是没有兑现。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的日记“实行”一栏的“八”即上午八点钟记有“作诗《周岁》”，这“诗《周岁》”正是后来发表于《晨报周年纪念增刊》同一版面上鲁迅《一件小事》和冰心短文之前的文字。

据鲁迅日记，他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得晨报馆信”。那段时间，鲁迅正忙于他在北京八道湾所购房屋的装修琐事，他到“单位”取信不是及时的。

在《晨报周年纪念增刊》发表了诗体贺词《周岁》的胡适，他当时的日记中载录着他是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写答《晨报》信”的。

可以初步确定：《晨报周年纪念增刊》向作者

发出商讨性质的约稿公函的时间是这一年的十一月中旬。

再查鲁迅日记，他和他二弟周作人一家是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移入八道湾宅”的。二十一日下午和晚上，鲁迅都在新家摆弄收拾。一切安定后，鲁迅美美地睡到第二天上午，起床后就写信给晨报馆，答应为《晨报周年纪念增刊》提供稿件。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正好是星期日，这天下午鲁迅接待了一批来祝贺他们一家乔迁新居的老朋友，这些老朋友全是当时的名流，如陈百年、朱希祖、沈尹默、钱稻孙、刘半农、马幼渔等。

应该处理的家庭琐事和必要的迎来送往都结束后，为兑现前天给晨报馆供稿的书面承诺，在二十三日的晚间鲁迅写了《一件小事》，第二天即二十四日下午把《一件小事》原稿寄给了晨报馆。

这就是鲁迅日记中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的两天所记上午和下午分别“寄晨报馆信”的实际内容。

二十日晴上午往銘伯先生寓 午後得蔣抑之信 晚於伏園來
宋子佩來

二十一日晴上午與二弟眷屬俱遊入八道弯宅

二十二日晴上午寄晨報館信 午後往留黎廠買嵩察寺及南
石窟寺碑陰各一枚仙經殘石四枚共券五元 往臨順龍牙醫
生寓屬拔去一牙與泉二區觀音寺街買物 夜風甚大

二十三日晴風星期休息下午陳百年朱遏先沈尹默錢福孫
劉半農馬幼漁來

二十四日晴下午寄晨報館信 往歷史博物館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晚，晨报馆“请吃饭”。胡适在这天晚上六点钟礼节性地先出席了一个叫“潘力山”的人邀请的晚宴，稍坐即又匆匆赶去吃晚七点钟的晨报馆的晚宴，估计十九岁的冰心也去了。可惜鲁迅和周作人都因意外的原因而没有出席。鲁迅这天清晨就坐车离开了北京，先到天津，再转车去上海，最后到杭州回绍兴。此次，鲁迅回到故乡卖掉了老家的“祖屋”，把母亲和原配夫人朱安等家人接到北京八道湾定居。周作人则在前一天已是“右下腭肿，不便于饮食”了，十二月一日这一天还专门“至利亚买药，至校告假，下午一时返睡少顷。头痛，晚早睡”后“腭肿稍退”。

这个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的晨报馆晚宴，当然就是隆重庆贺《晨报》周岁纪念的程序之一，重要作者估计都在邀请之列。倘若鲁迅不是因家事拖累、周作人不是因口腔生病，他们多半会出席的。

现在可以确定下来了：鲁迅《一件小事》写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晚，一周后发表于十二月一日的《晨报周年纪念增刊》。

《一件小事》不是表扬信也不是检讨书

算不算先入为主,我不敢坚决否认,但我可以断定:仅仅为了概括“劳动人民身上”的“某些大公无私的优秀品质”(如唐弢写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的《“小事”不小——谈〈一件小事〉》,见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二月唐弢《鲁迅论集》第二一〇页),仅仅为了歌颂“下等人的高尚的精神情操”和鞭挞“上等人的丑恶灵魂”(如王景山主编、中国和平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九月《鲁迅名作鉴赏辞典》第四十五页刘国盈鉴赏文),已经三十九岁的写过成熟作品《狂人日记》等的鲁迅是不会写出满篇都荡漾着思想张力的“超短”小说《一件小事》的。把一件具有独创性的文学作品理解得等同于一封表扬信或一份检讨书,对于一位文学巨匠来说,是让后人中的严谨学者不堪忍受的。对鲁迅的小说创作的文本研究,我总觉得整体性的不够具体,没有在文本方面解读到作品自身,泛泛而论者比比皆是,

落到实处的真知灼见寥如晨星。

直到重读一九九一年第十期《读书》上所刊王乾坤《文化把握中的统觉——读罗素、鲁迅论轿夫断想》中有关《一件小事》的分析片断，我的眼前才豁然一亮。王乾坤没有具体释说到鲁迅《一件小事》的文本，但是他的论说方式指向了可以贴近鲁迅《一件小事》的释读思路，照录王乾坤的有关文章段落如下：

……鲁迅论车夫之笑是释读这篇短文的一枚钥匙。可是就笔者的阅读范围来看，人们很少做这种联想。解释者大同小异地说，它是鲁迅对劳动者传统的善良美德的歌颂，同时是知识者的心灵解剖或“慎独”。这当然不是全无道理，然而我想，这恐怕在更大程度上是解释者价值图式的“同化”。

由于这种同化作用，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推论给忽视了：如果车夫表现出的仅仅是传统美德，鲁迅何以会有以往不曾有过的突然“感

到异样的感觉”？我们知道，传统美德在中国百姓身上决不是一种偶然，而鲁迅既不是漂洋而来的绅士，也不是远离黎民的阔佬，他对中国的劳动者并不陌生，何以偏偏这一次无病呻吟，突发惊讶？

同化作用还使得解释者疏忽了文本给出的这样一个细节：车夫对坐车人（即他眼中的上等人）并不善良宽厚，对坐车人的冷漠和“走你的罢”的命令，他竟是“毫不理会——或者并没有听到”，不客气地将其晾在一边，“毫不踌躇”地放下车子，搀着显然比自己更下等的老嫗向前走去。

这个细节的价值蕴藉，其实就是“轿夫对坐轿人不含笑”。唯其如此，这才使痛心疾首于国民不争的鲁迅先生在“一天比一天看不起人”的悲观心情中，突然“感到异样的感觉”，从而“增加了勇气 and 希望”。这个希望就是：在中国，有对坐轿人并不一定含笑的车夫在，有对上等人并不卑躬的民众在。这个希望与他